

也谈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与高尚全先生商榷(何干强)

[信息来源:]

[上传时间: 2006-04-09]

关闭窗口

也谈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 ——与高尚全先生商榷

何干强

内容提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总结改革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这对于贯彻落实好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认为，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和指导中国改革，应当坚持中国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认清私有制市场经济观是当前阻碍改革的主要传统观念、坚持改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坚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改革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弄清目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拉大主要是所有制关系急剧变化的表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公平、着眼于改善初次分配关系来解决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改革实践的指导作用、在改革中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实践论、坚持科学发展观与科学改革观的统一。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中国改革

作者：1946年3月，生于湖南长沙，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

《新华文摘》2005年第24期以头篇的位置，刊登了原文为同年10月3日《经济观察报》对高尚全先生的访谈的文章，标题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①]这的确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课题。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总结改革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这对于贯彻落实好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可是，笔者在读了高先生的文章之后，却感到此文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名义下，对人们实事求是地反思改革提出批评；并提出了一些从西方经济学照搬过来的、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和主张，这就不能不加以澄清。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评价中国改革，并进一步推进改革呢？下面，笔者针对高先生的文章，提出十个观点，以便促进研讨。

第一个观点：坚持中国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首先，必须牢牢把握认识中国改革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我们党的重要文件对此做过一系列的深刻表述：“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②]“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③]。“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叶的修补，而是经济

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④〕“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⑤〕这些关于中国改革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阐述，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正是因为如此，在改革进程中，一旦出现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割裂开来的偏向，人们提出批评也就顺理成章。这决不是反对改革，而是为了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保证改革的健康发展。

高尚全先生说，“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就是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这种判断完全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利己的“理性经济人”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假设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为永恒合理的经济制度，崇尚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反对政府宏观调控，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然采取敌视态度，竭力主张并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是一种极其鲜明的具有私有制意识形态性质的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在原苏联、东欧，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付诸实施，造成了严重危害。但是，按照高先生的理解，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改革！按照高先生的理解，面对有人（突出的是张五常）利用我们的大学讲坛公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一批经济学家挺身而出，揭穿他的真面目，就是“荒唐到这个程度”！试问，如果这些都属于反对改革，那么，放任新自由主义在我国泛滥，推行私有化的“改制”思路，怂恿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为私人侵蚀，这些就是支持改革吗？

其实，我国一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不是“近年来”才开始的，而是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只是由于人们对国外各种市场经济思想的深入了解需要一定时间，而有人又把新自由主义当作现代经济学的精华来吹捧，所以对它的批判一开始未能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直到近几年，随着《西方产权理论评析》、《混乱的经济学》、《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新自由主义评析》、《产权理论与国企改革——兼评科斯产权理论》〔⑥〕等一批有理有据、有破有立地深刻揭示新自由主义本质的学术著作产生出积极的社会影响；同时，一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国有资产流失、公有制经济比重急剧下降、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等严重现象，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性在中国开始明显暴露，越来越多的人才认清了它的真面目，它才逐步失去了舆论阵地。面对新自由主义“近年来”在中国的威风扫地，高先生却大声疾呼“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是为了从国情出发，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才能在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过程中，将其自发性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避免其副作用。因此，批判新自由主义，正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改革，就应当反思和消除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第二个观点：认清私有制市场经济观是当前阻碍改革的主要传统观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经济形态。党中央鲜明地指出，“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创举。”〔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⑧〕这就要求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解放思想，冲破传统观念，紧密联系改革实践，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观点。但是，什么是当前阻碍中国改革的传统观念，理论界的认识并不一致。高尚全先生把这理解为“我们在思想上长期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则认为，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私有制市场经济观已成为当前阻碍改革的主要传统观念。

我们不能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对市场经济的排斥，这一点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恐怕已没有多少人持反对态度；同时，我们也决不当否定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科学精神，

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失去了理论源头。计划经济是否应当根本否定？如果把计划经济等同于传统的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那当然是需要扬弃的。但是，事实上，计划经济这个概念并不是只在这种特指的含义上使用；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经济是一种手段，人们普遍赞同这种解释。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提出：既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手段，为什么只能要后者？没有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难道是现代市场经济吗？难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手段吗？难道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不要运用计划经济手段吗？其实，我们要坚决否定的，是属于自然经济观的“计划经济”，也就是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及其观念。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要抛弃遵循价值规律进行计划调节、遵循按比例发展规律调控社会再生产的计划经济思想。这里的关键，是不应当把计划经济与计划产品经济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我们要扬弃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观念，但是决不能笼统地取消计划经济，把计划经济贬义为陈旧的传统观念。这里有必要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把反映社会化生产要求的计划经济思想等同于社会主义思想来反对的；笼统地批判计划经济，就很难与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划清界限。

改革是有破有立的过程，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取代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实践过程。在后者已被突破的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弄清市场经济不可能孤立存在，它总是同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目前在实践上最重要的，就是要促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促进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耦合。这里当然会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阻力，直接对立的就是私有制市场经济观。因为这种观念认为，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是对立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也是对立的，人类历史上的市场经济都是也只能是私有制经济。这种观念把市场化改革等同于私有化改革。新自由主义正是这种传统观念的理论表现。所以，要真正实现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伟大创举，就必须破除私有制市场经济观，因而抵制和批判新自由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个观点：坚持改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获得成功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的改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我们必须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评价改革实践。

中国改革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包括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的改革。实践表明，在具体改革上，凡是能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就能比较顺利地达到目的；反之，则会受到挫折。这是因为，中国改革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真正了解具体情况的是人民群众；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是为了增进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改革，就会找到正确的路径，就会获得克服困难的智慧和力量。以深层的所有制方面的体制改革为例，在农村改革中，以家庭承包经营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成功形成，正是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的结果。但是，在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却走了弯路。一些地区没有遵循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而是搬用国外理论界也存有争议的“经理层购买”（“MBO”）；在实际做法上，依靠的是经理层，把本来属于工人阶级成员的公有制企业管理者，通过持大股而转变为私有财产所有者，把国有企业转制为私人控股企业，这种把管理者与职工群众在利益关系上分离开来的结果，导致劳资对立，国有经济比重缩小，还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国有资产流失。人民群众对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这种不良倾向提出异议，反映出的是希望改革健康发展的强烈的主人翁意识，而决不是反对改革。

高尚全先生说，他长期在国家体改委担任副主任职务，对改革与发展“是一个有发言权的见证人”。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判断改革措施的优劣就只能是“体改委”的领导干部，

而广大人民群众就没有提出不同看法的发言权，没有资格当见证人呢？其实，后者才最有发言权，才是最权威的见证人；而领导干部是否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他提出的政策和措施正确与否，最终也要由人民群众来判断。遵循这个道理，才算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

第四个观点：坚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改革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自觉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要求的思想的社会关系形式。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维护，同时必须防止私有制意识形态的消极和腐蚀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基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力所在。所以，它离不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维护。在改革实践中，不仅要树立市场经济观念，同时，也要增强社会主义观念，这样才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体制创新。因此，只要不是排斥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改革就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果不重视社会主义观，只单纯地强调市场经济观，那么，在国际私有制市场经济观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现阶段历史条件下，要确立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观念，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应当看到，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界存在一种淡化乃至回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倾向，有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是经济关系，不必把意识形态扯进来。这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在改革中谁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谁就会阻碍改革。但是，实际上，一些反对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却大力宣扬利己“经济人”这种隐含私有制意识形态的经济思想。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看来，高尚全先生也是不主张在改革中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他把人们对一些地方搞私有化是背离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批评，指责为“意识形态化的极端判断”，但是对那种一刀切地私有化“转制”措施，却不加任何批评，这怎么能说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呢？

第五个观点：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从根本上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如何看待和解决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人们最关注的问题和经济学界争论的热点。[⑨]我认为，目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拉大主要是所有制关系急剧变化的表现。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动，大体有五方面的原因造成居民收入差距：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不同行业或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在竞争中形成的效益差距，导致个人收入出现差距；二是公有制单位的内部打破平均主义之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由劳动者个人劳动能力方面的差距形成的收入差距；三是因体制改革进度不平衡，公有制经济内部某些垄断性的行业如金融、电信等行业的收入分配，缺乏应有的调控制约，收入水平过高，造成行业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拉大；四是私有制经济的发展造成的企业主和雇佣工人之间具有两极分化性质的收入差距；五是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管理上的漏洞，使非法、腐败行为有可乘之机，造成个人收入差距。高尚全先生说，“老百姓最不满意的的就是权钱交易、发横才的、暴富的”。由此看来，他认为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是第五种；而除此之外，收入差距的拉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

我认为，非法、腐败行为导致的收入差距，当然是老百姓痛恨的，不合理的。不但是在中国，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非法敛财都是不合理的，要受到法制惩罚的。但是，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简单地把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性仅仅定位在存在非法、腐败行为上。我们不能回避，一旦改革具体思路或措施方面出现失误，也会造成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拉大。目

前，公有制经济比重急剧缩小，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急剧扩大，这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拉大的主要原因。而出现这种情况正是与改革过程中忽视对公有制经济的维护相联系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居民收入属于分配关系范畴。“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10]，也就是说，一定的分配关系是由相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尽管说，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影响具体收入分配关系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诸如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不同行业单位之间具体分配体制差异、贪污走私等非法行为、馈赠、遗产、获奖等等。但是，在收入分配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所有制关系，因为收入分配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关系或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中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决定和控制的。因此，所有制结构的急剧变化，必然表现为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的急剧变化。有研究报告披露，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上通行的警戒线0.4，接近0.5。[11]江苏省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相对较小的省份，但是近些年来收入差距也明显拉大，从2000年到2004年，10%最高收入居民家庭与10%最低收入居民家庭的收入比，从5.39倍急剧上升至10.7倍；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从0.29，显著上升到0.358。[12]而正是在此期间，在江苏省的资本构成中，国有和集体资本所占比重从36.36%急剧下降到13.6%，而私人资本则从9.42%上升到17.6%，外商和港澳台资由32.03%上升到45.2%，法人资本由22.19%上升到23.5%。[13]这种真实的相关关系验证了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正确性。

一些地方不是从维护公有制经济出发改革管理体制，而是对公有制适应市场经济根本丧失信心，把公有制经济的体制改革等同于“民营化”实质为私有化，这能说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吗？这其实是一种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将带来长远不利影响的不合理。只有真正通过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把公有资本管理体制与公有资本保值增值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共同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关系，逐步增加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但是，这一方面，高尚全先生却避而不谈。

第六个观点：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公平

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现状，引起了理论界对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探讨。高尚全先生关于“市场要讲求效率，政府要强调公平”的观点，正是理论界具有倾向性的流行观点。

流行的观点其实来自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关于平等与效率的思想。阿瑟·奥肯承认美国社会制度中的市场经济存在贫富的不平等，认为这会影响到经济效率（笔者按：实质是资本家阶级的利润率），于是提出了用累进税、转移支付和对工人进行职业培训等办法，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平等，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这些思想产生在美国有一定的进步性；就研究国民收入再分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社会保障制度而言，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但是，必须充分认识，阿瑟·奥肯没有看到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私人占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看不到这种对抗性的矛盾正是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根源，他提出的缩小贫富差距的办法，并不触及资本主义根本经济制度，不触及资本主义初次分配制度的不合理；相反，却相信，“大多数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所反映的机会不平等，可以在现行制度结构中加以有效的纠正”[14]。而且，他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同起来，对后者抱怀疑态度。因此，阿瑟·奥肯主张的是一种维护资本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改良主义，并不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经济思想体系。

唯物史观认为，公平是历史的范畴，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相应的生产关系不同，公平的内涵也就不同。经济公平属于分配关系范畴，必须结合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来理解经济公平；而生产关系是多层面的，因而经济公平也是多层面的。由于经济公平关系就是用同一经济尺度衡量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权利关系，所以，经济尺度内容不同，经济平等的规定性就不同。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不同的经济层面，公平都是有不同内容的。[15]因此，不能把不同经济层面的具有不同规定性公平含义混为一谈，更不应笼统地用一般流

通层面或者市场交换的公平来说明其他经济层面的公平。

一般的公平概念是在商品货币关系普遍化的条件下产生的，反映了一般流通层面经济关系的客观要求。但是，一般流通只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表层，它并未暴露深层的即生产领域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尽管说，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的公平，在一般流通层面上有共同之处，如都存在自主选择、等价交换的经济权益；但是，在深层的所有制关系上却存在根本差别。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中，劳动者拥有等量劳动交换（包含必要的社会扣除）这种索取生产成果的公平权利；而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者只能按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获取报酬，表面的公平权利掩盖了实质上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不公平权利，这两种制度下的经济公平就存在根本的区别。社会主义的收入平等，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平等，或消灭阶级差别的平等；这与资本投资者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平等权利显然也是不同性质的平等。

可见，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不能停留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表层，抽象地侈谈公平，这除了使人们产生迷惑，解决不了任何实际的公平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公平，固然要重视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努力实践由它决定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积极探索和创造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具体形式，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经济公平。

第七个观点：着眼于改善初次分配关系解决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

根据关于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唯物史观经济学原理，解决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办法，必须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调整和改善所有制关系，着眼于改善初次分配关系。

在唯物史观看来，国民收入分配存在着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基本层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在直接创造、实现价值财富的物质生产和商业领域进行的，或者说，是在职能资本运动的领域中进行的。[16]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之后，又以各种途径在全社会进行再分配或第二次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直接决定着初次分配关系，也支配着再分配关系。初次分配形成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支配的基本利益关系格局，而再分配也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为前提的。再分配可以弥补初次分配的某些缺陷，但是不可能改变初次分配的基本格局。在现代社会，国家在再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国家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所以它不可能改变它所维护的所有制基本格局，因而，它所控制的再分配也就不可能改变初次分配的基本利益格局。[17]

但是，目前却流行“再分配促进公平”论，高尚全先生关于“市场要讲求效率，政府要强调公平”的观点，正是这种理论的表现。我认为，这种观点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同起来，断定市场经济效率与贫富差距不可分离，完全无视公有制市场经济本身就具有促进经济公平的作用；而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被动地由政府（笔者按：代表总资本家）出面，用二次分配方式解决私有制社会矛盾的方法照搬到中国来，当作是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途径，这是完全地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

值得提出的是，在我国，这种主张在理论上与“私有制经济优越论”往往联系在一起，在实践上容忍乃至主张私有化，而在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后果之后，又把难题的解决往政府身上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政府财力是有限的，让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集中到政府来解决，造成广大群众与人民政府之间的矛盾，这种主张的后果，难道不发人深思吗？我认为，只有着力于改善初次分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把它与改善政府的再分配职能结合起来，才真正有助于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合理的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第八个观点：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改革实践的指导作用

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应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进一步的改革实践。而只有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真正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沿着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前进。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经济形态的经济学，它的方法论其实是经济过程辩证运动的客观反映，它的一系列范畴和原理都是对客观经济联系和规律的揭示。就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马克思提出的关于过渡性经济形式、关于劳动二重性、关于一般流通与资本流通共性、区别和联系、关于经济现象与经济本质的联系与区别等一系列原理，都有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重要指导作用；我们在改革实践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发挥这些优势。

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界存在着放弃、淡化或者削弱这些优势的倾向，有人甚至主张直接用西方经济学（通常指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体系来解决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18]这种情况在高尚全先生的文章中有两方面的表现：

其一，只讲市场经济的一般现象而不讲现象背后的特殊本质。高先生说，在他的建议下，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写进了中央有关文件。应当说，肯定不同社会制度的市场经济具有某些共同现象，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19]相对于排斥这些现象，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的现象形态上，否认现象背后经济制度的本质区别，那就毫无创新之处；而将这种认识付诸实践，还会提出模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张。不能忽视，相同的现象可以有不同的本质，相同的形式可以有不同的内容。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与市场关系相结合的经济形态，那么，在资本市场关系背后，公有资本体现的生产关系就与私有资本有本质的区别；劳动市场的本质就不是劳动力商品的交换关系，而是等劳交换关系。[20]如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力也等同于商品，那么，在实践中就不可能把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劳动制度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区分开来。须知劳动力商品并不是一般的商品范畴，而是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显著特征的范畴。难道目前我国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企业忽视职工社会主义劳动者经济权益的现象，与理论上的“劳动力商品论”、与那种把我国劳动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市场没有联系吗？停留在表面的现象形态，这是马克思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德语die vulgärökonomie，也可以理解为不涉及本质的、肤浅的经济学）的典型表现，决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在发展劳动市场关系（表现为自主择业、双向选择、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过程中，只有同时设法落实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人翁地位，才能真正构建出与社会主义本质关系相结合的劳动市场。

其二，照搬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来指导改革实践。高先生在文章中，运用诸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公共需求”、“公共产品供应”等范畴和“公平与效率”的原理，来解释和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这反映出他偏爱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术语的倾向。其实，离开了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抽象地谈“公共”，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虚伪性的表现，其目的是掩盖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诚然，不同阶级之间确有某种公共需求，政府对不同阶级也有某种公共服务，但是，决不当回避不同阶级、阶层之间有购买力的需求的重大差别；决不当回避国家政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功能。难道我们不当在经济改革中，更强调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相应的分配制度，来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吗？难道在我国不当更强调人民政府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职责吗？这里，不是说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术语一概不能用，而是说，对他们只有用唯物史观方法进行必要的“术语的革命”[21]，才能确定它们究竟能否使用，或者在赋予科学的含义之后在什么范围可以使用，把它们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的逻辑体系中来，使它们可以起积极作用。如果不加分析的照搬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术语，而放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术语，那就必定会误导实践、误导群众。

高先生批评“一些人连一些基本概念都没有弄清楚”。我认为，搞清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确实很重要，但是，就中国改革而言，首要的是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这是使改革沿着科学的轨道前进的思想保证。

第九个观点：在改革中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实践论

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和指导改革，应当遵循实践论的观点。具体的经济改革实践是存在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性的，我们应当尽可能地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减少失误，避免失败，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有效的成功。而要真正弄清客观规律，就必须不断地总结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实践论。因此，在改革实践不断深化的各个阶段，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反思，这是保证改革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大人民群众是从争取自身利益增长的实践价值目标是否得到实现，来判断改革实践是否取得成功的。毫无疑问，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这是因为人民群众的总体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改革实践作为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出现一些曲折是不足为怪的。在改革的进程中，当人民群众感到物质利益的增长出现阻力、居民收入差距存在逐步拉大的不良倾向之时，对具体的改革实践进行反思，这是十分必要的；而反对这种反思，倒是令人费解的。理论和实践（原苏联、东欧的改革失败）都证明，推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给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都会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害，而我国有些地方和部门对新自由主义的危害缺乏警惕，甚至如前所述，已经接受了不良影响在推行私有化改制。在这种情况下，能把抵制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的误导，说成是“反对改革”吗？

社会实践也是判断真改革与假改革的标准。积极推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真改革；而把市场经济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推行私有化改制，动摇乃至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这是假改革。在改革初期，人们的注意力难免集中在揭示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弊病，往往不容易发现那种名为市场化改革而实为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演变的真实意图，甚至还会从好处考虑，把那种虚假的“市场化”主张理解为“思想解放”；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当实践证明那种假改革主张并不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要走向资本主义制度，是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危害公有制经济基础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就必定会看出那些主张的真面目，并批判这些主张的错误和危害性。这种批判，正是为了促进改革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高先生却把这种批判指责为“反对改革”，不知他主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改革”？

第十个观点：坚持科学发展观与科学改革观的统一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22]。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我们党坚持实践论，反思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成果。科学发展观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构成的社会形态发展的各个方面，当然其中包括通过科学的改革，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就是说，贯彻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树立科学的改革观。

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意味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从全局与局部、眼前和长远的结合上谋划统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的辩证方法。科学的科学发展观对改革提出了科学的要

求。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改革，必然要求改革服从和服务于科学的发展观。

可以说，人们反思改革，批判新自由主义，正是为了更好地树立科学的改革观，从而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因为在改革中，只有促进经济体制适应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适应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并存的分配制度的要求，才可以保证社会有购买力的总需求与适应人民需要的总供给的基本平衡，这样才能保证宏观经济的良性运行，从而保证我国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一旦让私有化的主张得逞，两极分化将不可避免，在中国的国情下，不可能像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由于资本剥削的长期积累，由于霸权主义的支撑，代表总资本家的政府，可以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40%到50%，来缓解阶级矛盾，[23]这样一来，后果就只有重蹈原苏联东欧的覆辙，让社会经济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那是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决不愿意看到的！

综上所述，目前在理论界，出现了这样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在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思改革，坚决批判新自由主义，使改革沿着科学方向发展；一种，把批判新自由主义、反思改革当作反对改革，以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为指导，提出“改革”主张。高尚全先生就属于后者。我认为，这两种意见之间，决不是高先生所说的，是坚持改革还是反对改革之争，而是坚持还是反对科学发展观之争，是要不要坚持科学改革观、要不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向之争，也是要不要真正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改革之争。究竟哪一种意见是真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将会做出公正的判断。

2006年2月7日

※ 本文是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济学的唯物史观分析范式：科学特征与实践创新”（批准号：05BJL0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高尚全：《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新华文摘》2005年第24期，第1页至第3页。本文用引号标明的高尚全先生的话语，均出自该文，以下不再重复注明出处。

[②] 《中国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页。

[③]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页。

[④]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页、第19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页。

[⑥] 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程恩富、黄允成主编：《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何秉孟主编：《产权理论与国企改革——兼评科斯产权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⑦]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⑧]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65页。

[⑨] 中国社会形式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领导干部看2006》的问卷调研中，“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被认为是第一位受关注的问题。

[⑩]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93页。

[11] 《展望“十一五”：缩小贫富差距 促进共同富裕》，2005.11.24《中国信息报》“经济评述”。

[12] 数据来源：江苏省城市经济调查局《江苏城市调查》第23期（2005年12月02日）。

[13] 数据来源：《加快结构调整步伐 促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上)》，江苏省统计局《统计分析资料》

第74期（2005年12月06日）。

[14] 阿瑟·奥肯著，王奔洲等译：《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80页。

[15] 何干强：《论收入平等及其实现途径》，《经济评论》2002年第4期，第38页。

[16] 这里对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解释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的解释不同。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排斥流通，因此，在反映这种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初次分配的国民收入成果并未明确是价值财富，从而也就只把初次分配限制在物质生产领域，而不提价值实现的流通领域。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实现了的价值财富才能进行分配，所以，工商业领域的分配，都属于初次分配领域。

[17] 何干强：《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的根本指导方针》，贵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17页。

[18] 董辅弼：《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于光远、董辅弼主编：《中国经济学想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至第6页。

[19] 从现象形态的角度来看，劳动力市场应当表述为劳动市场（Labour market），何干强、束瑞和主编：《劳动力调节论》，东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第29页，第30页注①。

[20] 何干强：《试论等劳交换市场》，1987年第3期《社会科学研究》。

[21]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32页。

[22] 胡锦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83页。

[23] 吴建民：《把握时代特点走和平发展道路》，《新华文摘》2006年第2期，第1页。

上一篇文章：在洽方身边重读《资本论》（冒天启）

下一篇文章：美国评价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